

近年中國陳獨秀研究簡況

◎ 唐寶林

中國學術界對陳獨秀問題的研究是從1979年改革開放後開始的，此前在中共的多次決議、《毛選》、重要領導人講話，以及數十年來作為中共黨史圭臬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奉毛澤東命所作）中，陳獨秀都被死死地釘在「十宗罪」上，即：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因此這是一個不得沾邊的「禁區」。極少數有良知的學者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文和課堂上，曾試圖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積極作用，受到嚴厲的批判、鬥爭和迫害。

那時講新文化運動，只能提李大釗，有的學毛澤東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講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建黨，也只能講李大釗，再加一個毛澤東。胡華編的全國高等院校通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甚至說1920年毛澤東「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毛澤東在1936年自己對斯諾（Edgar Snow）說：1920年在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後，才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以上胡喬木和胡華的著作，在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時，也強調「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並說陳之所以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是「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是全黨「錯誤的選擇」¹。

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的第一年，適逢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接著，1981年又是中共建黨六十周年，向有「節日文化」傳統的中國，學術界趁胡耀邦、趙紫陽體制所營造的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在國內舉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和著作，開始較客觀公正地研究陳獨秀的歷史和思想。於是，在全國出現了持續至今的陳獨秀研究熱潮。在這兩次「紀念六十周年」的活動中，廣大學者包括不少其他著名人士，發出了恢復陳獨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建黨中的歷史地位的強烈呼聲。

隨後，經過眾多學者的長期廣泛的論證和宣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中共主要創始人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認知，並在各種媒體上得到反映。但是，1984年以後，隨著這股熱潮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陳學」終於成為一門「險學」，所受壓力愈來愈大。研究陣營分裂，有些問題發生嚴重分歧，近幾年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問題上：

關於陳獨秀的托派問題

陳獨秀被扣上「反革命」等罪名，主要是他1929年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引起的。那麼陳獨秀在托派期間到底進行了甚麼「托派活動」？當局至今絕對封鎖。事情原來是這樣的：陳在1929年以後的歷史真相是被人為掩蓋的，最原始的歷史資料在1952年12月23日全國托派大逮捕後

被全面清查和封鎖。文革中，這些資料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寶林在收集整理這些資料後，寫出了〈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刊登在極有影響的史學雜誌《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1989年又在此基礎上，出版了《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第一次系統論述了陳獨秀後期歷史和思想的真實狀況，特別是他與共產黨、國民黨、托派的關係、矛盾和鬥爭，引起很大反響。文章較客觀地展示了陳獨秀在這個時期在各黨派錯綜複雜的鬥爭中，堅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場和反對中共左傾錯誤的思想、主張黨內民主甚至容許黨內反對派合法存在，以及在各種勢力的威脅利誘和打擊迫害中，始終保持「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高風亮節。文章認為他與中共的矛盾是屬於革命陣營內部路線和策略上的分歧。雖然，他反對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當時看來是錯誤的，但他對中共長期在農村環境中發展，會被「農民意識化」的警告，卻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偉大的預言。以此，文章實際上推翻了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是「反革命」的莫須有罪名。與此同時，與陳獨秀後期歷史有密切關係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80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一輯）、《鄭超麟回憶錄》、《雙山回憶錄》（1980年人民出版社以「現代史料編刊社」的名義內部發行）也相繼問世，印證了唐的觀點。

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極左的理論，主張1927年中共失敗後，中國下一次革命應該在奪取政權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同時完成消滅封建地主、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所以，被稱為「一次革命論」；但其閃光的思想是主張黨內民主，容許黨內反對派的存在。所以，唐寶林認為陳獨秀轉向托派是「誤入歧途」。因為他的一生思想特點比較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實際，主張建立民主制度，發展私營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反對斯大林式的殘暴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晚年覺悟到馬列主義不適合俄國，自然也不適合中國，並主張對馬、列、托的理論重新估價。另一位學者王觀泉1996年在台灣出版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一書，則用明確的標題稱陳獨秀轉向托派是「走上另一條革命之路」。

但是，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第十三號文件《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稱：

陳獨秀自1929年因與托派勾結，成立反黨組織，並拒絕黨中央對他再三勸告，而被開除出黨。……以後甚至公開撰文詆毀我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則當然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

於是，國家新聞出版署每次發出的禁令，都把真實反映陳獨秀歷史真相並給予高度評價的研陳著作放在第一位。例如1988年6月6日發出的《新聞出版署重申幾類需經專項申報的選題的通知》中指出：

涉及黨史上陳獨秀、王明、張國燾一類人物的，地方出版社先報本省（區、直轄市）黨委宣傳部審批，中央級出版社先報各自主管部委審批，遇有把握不准的問題，提出自己意見，再報中央宣傳部轉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批……並抄報我署。未經申報並得到批准的上述選題，一律不得出版。

而真正按此規定上報審批的，較為客觀公正而與傳統觀念有抵觸的著作，一般都不予出版。最典型的的就是王觀泉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大陸先後有三家出版社與作者簽訂了出版合同，但都被審批者「槍斃」。第三次審批時，中央黨史研究室交給一位對陳獨秀毫無研究的人審批，最後竟寫出令作者哭笑不得的連陳獨秀ABC都不懂的修改理由。2002年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用小標題「反對托陳取消派的鬥爭」，對陳獨秀轉

向托派，不加分析地一味批判，不承認其有合理內核。

中宣部十三號文件、出版署的通知和中央黨研室的「新黨史」，在陳轉向托派問題上，實際依然堅守傳統的全盤否定的觀點，雖然不再用「反革命」這個詞。因為，1991年新版《毛選》的註釋，在事實和強大的輿論面前，已經明確把原來的「托派即漢奸、反革命」的定性，改為：「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

在上述雙方激烈鬥爭的時候，199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獨秀大傳》（任建樹著），代表了另一種被稱為「穩健派」的學者，採取了模糊態度：「陳獨秀這個人只要他認為認準了的事，他會毫無顧忌地去做。……歷史業已證明，許多有關中國革命的大事，他都是認準了的。而這次他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認準了沒有呢？」他把答案扔給了讀者。

關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是大革命失敗的根源。這是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和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所作的結論。後一決議這樣寫道：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1991年蘇聯瓦解，過去封閉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1998年，這套檔案中1920-27年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和唐寶林，先後利用這套檔案發表〈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和〈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長篇論文，徹底否定了統治中國幾十年的傳統觀念。後文認為：1923-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它是大革命失敗時，斯大林為推卸自己的責任、文過飾非的產物。

但是，中央黨研室寫的新黨史，無視他們自己翻譯的莫斯科秘檔和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所揭示的在危急時刻陳多次要求退出國民黨而被莫斯科拒絕後，不得不違心執行向國民黨妥協退讓的聯共及共產國際路線的事實，堅持所謂「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庸俗哲學，不僅在新黨史中設置一節小標題「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形成」，而且在大革命失敗的結論中寫道：「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結果，『自願地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毛澤東語），使黨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撰寫該書的主持者、中央黨研室副主

任石仲泉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向記者吹噓他們放棄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而保留「右傾機會主義」是一個重大突破時，唐寶林撰寫了〈分歧已經擺明，讓歷史去評判——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刊登在陳獨秀研究會會刊《簡報》總第31、32期）上，進行了全面的駁斥，引起了極大反響，但卻又再成了「犯上」之罪。

1999年5月出版的《陳獨秀大傳》，雖然在銷售宣傳中說該書引用了新公布的莫斯科秘檔，實際上由於時間倉促，只是蜻蜓點水，沒有用多少。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觀念還是舊的，如在當時土地革命等問題上說：「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和國際代表經過了幾度的爭論，多次的猶豫動搖，終於一起陷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深淵。」而書末以「附錄」的形式登載作者一篇舊文，最後一頁是以這樣的文字結束：

大革命失敗以後，斯大林說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的政策……都「是完全正確的」。問題是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極大的錯誤」。陳獨秀說他「忠實地執行了國際領導者」的政策……。其實「完全」的說法並不完全，「忠實」之談也不忠實。陳獨秀同國際領導人在某些觀點上可謂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些意見共產國際是正確的，陳獨秀沒有執行或執行不力；再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也並非都是同國際有牽連的。但無論如何，採取這種上推下卸的態度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可見各打五十大板，「中庸」到家了。

由於北京陳獨秀研究會堅持求真求實研究陳獨秀的歷史和思想，1993年10月創刊的會刊（唐寶林主編）為全國學者提供一個互相交流資料和成果的平台，並且經常提供難覓而珍貴的資料和新鮮、尖銳、深刻的觀點，特別敢於頂住阻力，堅持實事求是恢復陳獨秀在歷史上的本來面貌，嚴正批駁過去強加於陳獨秀頭上的莫須有罪名，大力宣傳陳獨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很快受到全國乃至海外學者的廣泛歡迎。於是，一個原來並不為人注意的小小的民間學術團體，依託其會刊，頂住愈來愈大的風險，把這股「陳獨秀熱」，一浪高於一浪地持續推向前進。其交納會費、自動捐款而加入研究會的會員，迅速從開始時的37人，發展到2003年的675人。這些人中，除了一部分過去在肅托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現在還未得到平反的冤主之外，主要有兩部分人組成：一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的歷史研究和教學工作者，一是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滿腔熱情為「民主中國」而鬥爭、解放後在一系列「專政運動」中飽受困惑和折磨、改革開放後又猛醒、重新為中國政治「民主化、現代化」而燃燒晚霞的「兩頭真」幹部。終於，這個陳研會不被容忍，於2003年11月4日，在不給絲毫理由的情況下，被突然「撤銷」。但是，這股求真求實的「陳獨秀熱」卻是無法鎮壓下去的，目前正在向縱深發展。

註釋

- 1 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2），頁38、54。

唐寶林 196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執行會長並主編會刊，直至2003年11月該會被撤銷。著有《陳獨秀傳》、《宋慶齡傳》、《中國托派史》等及論文多篇。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